

两千年间的“佛”与“国”： 传统中国对西方货币领袖头像的认知

林满红

内容提要：世界史中的货币图案大抵可分为西方的希腊、罗马体系与东方的中华体系。西方体系有政治领袖头像，东方则无之。虽然《史记》中已有安息大宛之货币有政治领袖头像的记载，但直到1912年，中国才有孙中山下令在中华民国开国纪念币及流通币上“刊第一期大总统肖像”。这一变化影响至今。在约两千年间，中国传统货币上的图案以文字为主，偶有图像，未及国家领袖头像。中国传统货币上的年号，难以让庶民一目了然，历朝铜钱或外国铜钱与本朝铜钱一并流通。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试图仿铸外国银币，仍未仿铸领袖头像。相对而言，公元1世纪之后，佛教广泛流播中国，佛像深入民间，而清代中国亦以“佛”称外国银币上的领袖头像。孙中山在传统中国的货币文化中引进国家领导人头像，就国家想象而言，是一个革命性的发展。本研究将由深入庶民日常生活的货币图案指出，在宗教治理现象同样浓厚的传统中国与西方，中国的国家意象相对西方较为模糊；相对以往个别有关传统中国国家观念或佛像的研究，本研究指出传统中国有关佛祖与国家信仰的深浅之别。

关键词：国家观念 宗教治理 国家—社会关系 中西文化交流 传统中国的货币图案

一、前言

在世界史当中，从有历史记录的社会来看，货币图案大抵分为两大体系：一是希腊、罗马体系，一是中华体系。希腊、罗马体系，起源于小亚细亚，再流播希腊、罗马，并影响了现代欧美各国。希腊、罗马体系铸币，多用金、银等贵重金属，采用打压法制造，其形制为圆形无孔，铭文多记下打制地点、年代、政治领袖名字及宗教颂词等，其币面刻有花鸟、野兽、植物或人物（包括政治领袖）等图像。亚洲伊斯兰教国家及波斯、印度北部因亚历山大大帝东征之故，也受希腊、罗马体系的货币文化影响，但因伊斯兰教国家禁止偶像崇拜，故不用人像图型，其他货币形式则与希腊、罗马体系相仿。中国铸币多用范铸而成铜钱，中央有方孔，币面刻有文字而不是图像。^①中华体系的货币文化流播韩、日、越等东亚各国。^②

在西方货币图案有政治领袖头像、东方则无之两股货币文化传统的发展过程中，由浙江钱塘人梁绍壬在1837年前夕的记录可知，至少在西汉时中国就知道西方（文献中指波斯）货币有政治领袖头像这种习俗：“夷国法，嗣王立，则肖其像于银面。《史记》所谓安息国以银为钱，钱如其王面。王死，转效嗣王面是也。”^③《史记·大宛列传》载：“安息（笔者注：波斯或伊朗）在大月氏西可数千

[作者简介] 林满红，“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台湾师范大学教授，台北，11526，邮箱：mhlmh@gate.sinica.edu.tw。

①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5、7页；王永生：《钱币与西域历史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47页。

② 王永生：《钱币与西域历史研究》，第150—151页。

③ [清]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卷3，《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57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77版，第42页a。

里。……城邑如大宛……临妫水，有市，民商贾用车及船，行旁国或数千里。以银为钱，钱如其王面，王死辄更钱，效王面焉。”《汉书·西域传》亦载：“北康居，东乌弋山离，西条枝。国临妫水。土著以银为钱，如其王面，王死辄更钱，效王面焉。”东汉末年至三国初年的张晏《汉书注》指出：“钱之文面作人乘马，钱之幕作人面形。”东吴韦昭《汉书音义》指出：“幕，钱背也，音漫。”《后汉书·西域传》也提及罗马多用金银：“大秦一名犁鞬，……东西南北各数千里。有城四百余所。土多金银奇宝。”^①这表明汉代的中国是知道西方有政治领袖头像的货币文化的。波斯银币目前在新疆或陕西一带都有出土，^②明显有政治领袖头像，参见图1。

中华民国成立之后，币政由财政部管理。1912年3月11日，临时政府财政部长呈请临时大总统孙中山鼓铸纪念币（亦为流通币）。孙中山针对相关图案发出“上刊第一期大总统肖像”的命令。^③这是中央政府首度将国家领袖头像放在货币上面，该变化影响至今。由公元前91年司马迁《史记》之纪录西方将领袖头像放于钱币之上，到1912年中华民国的开国纪念币将孙中山的肖像置于钱币之上，期间约有两千年的延搁。

在这两千年间，中国传统货币上的图案，以文字为主；偶有图像，未及领袖头像；中国传统货币上的年号，由各朝通行历朝铜钱及明清时期大量使用外币，可知其国家意象不如领袖头像；清代中国以“佛”指称首度大量使用有外国领袖头像的外国银币；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试图仿铸外国银币，但未仿铸领袖头像。相对而言，公元1世纪之后，佛教广泛流播中国，佛像深入民间。一如佛像，原非佛法无边之物，但它提供想象的触媒，让人们因其想到一些冥冥中的力量而产生托付之感。货币，尤其是纸币，其价值远低于面值，上面的国家符号却使人们相信它可以换取符合面值的物品或劳务。这种转变，一如清朝台湾商家用的量斗常常放在庙里，是神明的信仰使人们愿意相信商家会童叟无欺；日本割占台湾以后，量器由政府颁布。清朝台湾的商家领袖是在神明之前通过抽签产生；日本割占台湾以后，商家领袖由政府颁布的民间团体组织法规范其产生方式。^④由货币图案来看，辛亥革命使近代中国发生了以国家局部取代宗教的变化，成为人们一种信仰的转折。

孔飞力(Philip A. Kuhn)及康豹(Paul Katz)都提到传统中国社会中的宗教治理现象。^⑤杨庆堃(C. K. Yang)指出，传统中国社会不是像很多西方人所说的没有宗教信仰，这种宗教信仰到了民国以后在相当程度上被三民主义的信仰所取代。^⑥孙中山在这样的中国传统中引进国家领导人头像，而且一直影响往后的中国，就国家想象而言，的确是一个革命性的发展。本研究将由货币图案指出，传统中国在接受西方文化的过程中深度接受佛像文化，但对西方货币上的领袖头像则了无响应；在宗



图1 波斯银币（公元前1世纪后半，公元后1世纪前半）

资料来源：世界美術編集部編『世界美術大全集·東洋編15』小学館，1999，頁127。此图由熊昌锟博士提供。

^① [汉]司马迁撰，[刘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新校本史记三家注并附编二种》卷123《大宛列传第六十三》，台北：鼎文书局1981年版，第3157页。

^② 夏鼐：《综述中国出土的波斯萨珊银币》，《考古学报》1974年第1期；孙莉：《萨珊银币在中国的分布及其功能》，《考古学报》2004年第1期。

^③ 《大总统令财政部准照铸纪念币并教示新币花纹文》，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临时政府公报》第35号，台北国际印刷厂1968年印行，第10页。

^④ 林满红：《台湾商业经营的中国传承与蜕变》，黄富三、翁佳音主编：《台湾商业传统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1999年版，第13页。

^⑤ Philip Kuhn, *Soulstealers: The Chinese Sorcery Scare of 1768*,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107; Paul R. Katz, *Divine Justice—Relig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egal Cultur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⑥ C. K. Yang, *Religion in Chinese Socie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1, p. 381.

教治理现象普遍存在的中国传统社会,相对于宗教治理现象亦浓厚的传统西方而言,传统中国的国家意象实较传统西方模糊。相对于以往有关传统中国国家观念或佛像的研究,本研究将由图像指出两千年中传统中国有关佛祖与国家信仰的层次关系。

二、中国传统货币偶有图像但未及领袖头像

传统中国的货币图案,就最长期使用的铜钱而言,或表重量,或表年号,或表铸局,均为文字描述。唐代的铜钱,有时加入月亮、云朵、飞鸟的图纹,系受中亚影响,是为例外。^① 契丹及辽朝的铜币上有龙和月亮、星星,^②也是例外。银铤上的铸造地点、铸造银号、铸造银匠、铸造年代,也都以文字表达。元明两代纸币上面除了用文字标示面额、名称外,有较多文字说明禁止制造伪钞,且逐渐出现图案:元代纸币边框有蔓肥叶硕果纹饰,明代纸币边框则有龙的纹饰。^③

从顺治年间钞贯停发以后,清政府有 180 多年未发行纸币。咸丰时期为了筹措战费镇压太平天国,由户部于 1853 年开始发行官票,票面写“户部官票”,另外又发行大清宝钞。^④ 明代的龙形图案被延续用于清代的户部官票及大清宝钞。户部官票,又称银票,以银两为单位,用高丽纸印刷,实际发行时有 1 两、3 两、5 两、10 两和 50 两多种。大清宝钞,以制钱为单位,又称钱票、钱钞,票面额初分为 250 文、500 文、1 000 文、1 500 文、2 000 文几种。官票大小与宝钞相近,上方及左右作龙纹,下方作波浪纹。^⑤

龙的图案出现在户部官票、大清宝钞之后,龙相当于是官方专有的权威象征。1897 年 5 月 27 日,由督办铁路总公司事务大臣盛宣怀奏请设立的中国通商银行(由官方持股成立的中国第一家现代民间银行)于 1898 年开始发行银两票,其上即有双龙戏珠图案。但双龙戏珠图案出现在有签发使用时间的民间钱庄、票号纸币之上,则开始于 1906 年。^⑥ 清代出现的民间纸币,其上常有执照、信票、兑票、支票等以文字表示的名称。在纸币边框的部分,最常出现的图案有古文、回形纹、云形花纹、直线、明(暗)八仙、古代人物、岁寒植物、琴棋书画及祥禽瑞兽等 9 种。^⑦

加上唐代、辽朝的铜钱出现了月、云等自然景象图案,中国传统货币在以文字为主的图案之外,也包含一些图像,但一直没有如希腊、罗马体系货币般出现国家领袖头像。

三、年号的国家意象不如领袖头像

六朝以前,中国以重量作为铜钱名称,如秦半两钱(即 12 铢,1 两为 24 铢)。自汉以后,吕后时改为 8 铢,文帝时改为 4 铢,武帝时改为 5 铢。^⑧ 六朝以后,铸币逐渐以当时的皇帝年号加于重量名称之上,如太和五铢、永安五铢等。到了唐代,将铜钱改称为通宝,再冠以年号,如开元通宝。通宝之名,历代亦称泉宝、重宝、元宝等。^⑨

在中国传统货币图案上,以文字表达的统治者年号可以具有国家意象。以清朝征服新疆、西藏以后的情况为例,可看出铸有年号的中国货币被用来宣示有效统治范围。魏源《圣武记·军储篇》指出:“自乾隆平定新疆、西藏后,命于天山南北路各城设局鼓铸普尔钱,文曰乾隆通宝。皆镌地名用国

^①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 184—185 页。

^② 有关契丹文“大德兴国”铜钱,参见裴元博、陈传江《契丹文珍稀钱币考释图说》,北京:安徽美术出版社 2011 版,第 88 页。

^③ 上海市银行博物馆、台湾永丰金控展览小组:《汇通天下——从钱庄到现代银行》,台北:永丰银行 2012 年版,第 76—77 页。

^④ 张翰中:《战后初期台湾货币改革之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成功大学,2008 年,第 15 页。

^⑤ 戴建兵、陈晓荣:《中国纸币史话》,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31—33 页。

^⑥ 张敦智:《清代民间纸币编排设计之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云林科技大学,2013 年,第 122—123 页。

^⑦ 张敦智:《清代民间纸币编排设计之研究》,第 56 页。

^⑧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 67—92 页。

^⑨ 青岛博物馆“货币部分”,2013 年 7 月 18 日参访纪录。

书回字矣。又命驻藏大臣监造大小银钱,面文乾隆宝藏汉字,背用唐古特字,并于边廓铸造年分。”^① 1759年清政府统一新疆后的第二年,即在南疆回收改铸准噶尔普尔钱为新钱。“普尔”的当地语义为“钱”,新钱配合当地习俗,每枚重2钱,且用提净红铜制成,故新铸钱币色泽红润,习惯称之为“红钱”。该钱一面铸“乾隆通宝”汉字,一面铸满文及回文(即察合台文)。红钱仅流通于天山南路,天山北路(即北疆地区)则统一使用内地所制铜钱。当乾隆皇帝看到南疆所铸“乾隆通宝”后,曾赋诗一首曰:“天佑西师蒇大功,劳徕泉府贵流通。形犹腾格因其俗,宝铸乾隆奉此同。”^②有着乾隆年号的钱流通到新疆、西藏,表示国家的统治力量已达这些地区。但新疆、西藏仍局部沿承希腊罗马货币文化,准噶尔普尔钱采用源自西方的打压法制造,红钱则采用源自中国内地的范铸技术。1840年左右西藏地方铸八思巴文——章噶币(1章噶合银7.5两),由手工打造币文为“司徒格贝扎呀”应该是康区司徒家族所造。^③ 西藏因为不产铜,又受印度的东印度公司影响而铸造银币。银圆中央没有方孔,而有一个方框图形,取代方孔,^④其背用唐古特字,并于边廓铸造年分,呈现了希腊、罗马货币文化。

就中国内地来说,对于表达帝王年号的文字,传统中国大多数不识字的庶民能否辨识? 鸦片战争前后,在白银短缺时建议发行纸币的王瑬,想在纸币上印刷晚明生员朱用纯编撰的《朱柏庐治家格言》。^⑤ 在同时代对王瑬的批评中,许楣注意到钱庄发行的纸币上原印有《朱柏庐治家格言》,但拿这些文字问北京的车夫,他们都不能辨识,甚至有人连纸币上的钱铺名号都无法辨识。论曰:“吾游京师。见钱票,多有取《陋室铭》《朱柏庐家训》作细楷,刻印其上者。尝试举以问车夫,则皆惶不知何语,至有并钱铺之名号不识者,乌在其识字也。”^⑥

根据清末海关估计,在1880年前后的沿江沿海地区,学龄以上男性大约只有一半受过某种程度的教育。20世纪30年代卜凯(John L. Buck)针对农村的大规模调查发现,7岁以上男性约有45%受过某种形式的教育,其中约有30%识字;7岁以上女性约有2%受过某种形式的教育,其中约有50%识字。^⑦ 可见传统中国约85%以上男性与99%女性无法辨读钱币上以文字表达的帝王年号。

中国历朝历代都会流通前朝铸币,多少也表明传统中国的一般百姓对货币与统治者的关系感觉不深。1685年清朝的一场争论也说明新朝铜钱与历朝铜钱并行的情况。康熙二十五年(1686),福建督抚请示中央,以所辖州县多用古钱应否禁遏,或听从民便,户部议:一概古钱悉行销毁。康熙皇帝持保留态度,请内阁官员表示意见。徐乾学指出,“自古流行之宝,自汉五铢以来,未有废古而专用今者”,新莽、隋朝、明天启年间曾有例外,均告失败。^⑧ 日本割占台湾时,也发现有中国历代铜钱。^⑨

一般百姓对货币与统治者的关系感觉不深也见于清代中国局部地区之使用越南或日本铜钱。新疆乌鲁木齐及其附近的头屯河地区出土的越南钱币“景兴通宝”“景兴大宝”“景兴至宝”“永寿通宝”“永盛通宝”“嘉隆通宝”等,主要是由于清乾隆年间越南一位名叫黄公缵的将军因与其统治者不

^① [清]魏源:《圣武记》,《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02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77版,第42页a。

^② 王永生:《钱币与西域历史研究》,第220—225页。此书第227页亦指出,乾隆年间“每一普尔,值银一分。初以五十普尔为一腾格,后定以百普尔为一腾格,值银一两”。

^③ 中国金融学会等编:《中国金融珍贵文物档案大典(西藏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1页。

^④ 谭彼岸:《中国近代货币的变动》(原载《中山大学学报》(台北)1957年第3期),收于存萃学社编:《中国近三百年社会经济史论集》,香港:崇文书局1979年版,第208页;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785页。

^⑤ 林满红:《银线》,台北:台湾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版,第146—147页。另可参见张敦智《清代民间纸币编排设计之研究》,第177页。

^⑥ [清]许楣:《钞币论》,道光二十六年(1847)古籍海昌许氏古均阁刊本,第19页b。

^⑦ Evelyn S. Rawski, *Education and Popular Literacy in Ch'ing China*,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79, pp. 6—18.

^⑧ 林满红:《银线》,第29—31页;[清]徐乾学:《用古钱议》,《憺园文集》,卷13,第9a—11a页(郑永昌先生提供)。

^⑨ 大藏省编纂:《明治大正财政史》卷13,东京:财政经济学会1939年版,第472—473页,转引自张翰中《战后初期台湾货币改革之研究》,第31页。

合而带领一些军人投奔清朝,并在此使用这些钱币。^① 19世纪30年代广东潮州府与福建漳泉地方都有光中、景盛、宝兴年号的越南铜钱流通。^②

受中国影响,970年以后越南铸造的钱币几乎全为年号钱,有些甚至直接借用中国的年号。钱币上使用的都是汉字,有篆、隶、楷等书体。因材质、文字、大小、形制等与中国钱币完全相同,故经常混杂使用。甚至在货币制度上,越南也有类似中国的省陌制度,如陈朝时期曾规定以69文当100文行使,上缴税收时则有以70文当100文、700文当1贯的做法。越南现在使用的货币单位“盾”(đồng),实际对应的就是汉字“铜”。在越南南北成立诸多政权之时,南部的后黎朝、南阮朝、西山政权也都铸造了各自的年号钱,其中以后黎朝显宗使用了47年的景兴年间铸造的钱币最为繁杂。^③

1833年,闽浙总督程祖洛也指出福建厦门及浙江乍浦都有日本宽永钱流通。^④ 日本受中国影响而于683年后开始使用铜钱。铜钱的来源,最初全从中国输入,称为“渡来钱”,以宋钱为最多,唐钱、明钱次之。日本也曾大量仿铸中国古钱,主要是仿铸宋钱,被称为“长崎贸易钱”。但708年之后,日本开始仿照唐朝“开元通宝”钱铸造有本国年号的铜钱。日本江户时代的“宽永通宝”钱,从1626年开始,一直铸造到明治初年,历时240多年,日本各地都有铸造,版式有几百种,是日本古代钱币中使用时间最长、数量最大、版别最复杂的钱币。^⑤

中国使用外币最明显的莫过于18和19世纪时直接将外国银圆用于一般交易,甚而用于纳税。^⑥ 由中国并用各个朝代的钱币以及清朝政府接受外国货币缴税,可以看出就传统中国人而言,货币并不像对现代人一样,是划分统治范围或国家疆界的重要社会制度。另一方面,清政府的白银,无论是银圆还是银两,都依赖商人供应,这与印度和日本的政府有所不同。印度是亚洲另一个大量用银的国家,其银圆是由政府铸造,日本德川幕府铸造另种形式的银币,可见就清代的中国货币供给而言,民间相对政府来得更为重要。^⑦

此外,由18、19世纪中国民间称有西班牙国王头像的银圆为“佛银”“佛面银”“佛头银”等,更可见在一般百姓的视觉世界中,“佛头”“佛面”比统治者的头像更为熟悉。

四、以“佛”称首度广泛使用的外国领袖头像

17世纪的中国开始广泛使用西方白银。当时由西方流入中国的银圆与18世纪流入者,其制造者与制法有所不同。明清之际流入者颇多由荷兰各省铸造。清康熙年间前来台湾的郁永河曾指出:“番钱者,红毛人所铸之银币也。圆长不一,上印番花。”^⑧这种银圆上面有马、剑,故称“马剑银”。用来铸币的银主要来自西班牙所属的美洲殖民地。西属美洲殖民地产银,16世纪时以秘鲁的银矿为主,到了17世纪,改以墨西哥的银矿为主。因17世纪欧洲的金融中心在荷兰,而西班牙所属的美洲殖民地的银矿多由私人开采,除了运至英国、法国或其他欧洲国家购买商品之外,很多运抵荷兰铸造银币。1700年以前巴达维亚的华商与荷属东印度公司垄断中国茶之出口欧洲,荷兰所铸银币因而大量流入中国。当时流到中国的欧洲银币也有少数法国或意大利的银币,上面也有路易十四的头像。^⑨

^① 王永生:《钱币与西域历史研究》,第199页。

^② 林满红:《银线》,第33页。

^③ 王永生:《钱币与西域历史研究》,第152—153页。

^④ 林满红:《银线》,第33页。

^⑤ 王永生:《钱币与西域历史研究》,第150—151页。

^⑥ 林满红:《银线》,第42页。

^⑦ 林满红:《银线》,第62—64页。

^⑧ 谭彼岸:《中国近代货币的变动》,第202页。

^⑨ J. Busschers, *The Mexican Pieces of Eight Reales and Their Dominance in Southeast Asia: An Historic Survey of More Than Three Centuries of A Trading Coin*, Netherlands: Driebergen, 1999, pp. 46, 51;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78页。

1536年起墨西哥已有手工打造的银币，称为“切币”或“方币”(cob)，而非圆币。又因西班牙曾由伊斯兰教徒统治，受伊斯兰教的货币图案影响，并未在银币上刻有国王头像。^①这种银币主要经马尼拉在与中国易换生丝等商品时流入中国。此外，明清之际，也有葡萄牙制的银币由澳门进入中国易换生丝等商品。^②

到了18世纪，西班牙由17世纪较为神权导向的哈布斯堡王朝统治转为开明专制的波旁王朝统治。除了西属美洲殖民地的银矿产量大增之外，货币形式的改变也推动了货币的流通。1759年以后墨西哥所铸银币显著增加，由1759年的1300万比绍增为1800年的2500万比绍。从1732年起，西班牙在美洲殖民地引进螺旋压力机铸造银币，形制转为圆形，而且较为统一，并在银币的边缘压印像麦穗的花纹，可避免切剪。这种银在中国称为“花边银”，因上面铸有双柱，代表直布罗陀两岸的岩石，故又称“双柱银”或“双烛银”。1759年西班牙国王查理三世登基，将波旁王朝推到鼎盛时期。为加强西班牙母国与殖民地的统一与整个帝国的威仪，查理三世于1772年下令在之后殖民地铸造的银币上加铸他穿上战袍、戴上桂冠的头像，母国的头像则未戴桂冠，也未穿战袍，母国所铸银币也不出口。在民族主义日趋昂扬的18世纪欧洲，将国王头像加到银币上，甚为普遍。^③

表1 西属中南美洲18世纪铸币情况

矿场所在地(目前所属国家)	双柱银	有国王头像银
墨西哥市(墨西哥)	1732—1771	1772—1821 银；1732—1821 金
利马(秘鲁)	1751—1772	1772—1824 银；1751—1821 金
波多西(玻利维亚)	1767—1770	1773—1825 银；1778—1824 金
波哥大(哥伦比亚)	1759—1762	1772—1819 银；1756—1820 金
库斯科(秘鲁)	—	1824 银与金
危地马拉市(危地马拉)	1733—1753 1754—1771	1772—1821 银；1733—1752 金 1754—1817 金
圣地亚哥(智利)	1751—1770	1773—1817 银；1749—1817 金
波帕扬(哥伦比亚)	1769	1810—1822 银；1758—1820 金

资料来源：Chester L. Krause, Clifford Mishler, Colin R. Bruce II, eds., *Standard Catalogue of World Coins Spain, Portugal and the New World*, Iola, WI: Krause Publications, 2002, p. 11。

由表1可见，“双柱银”在拉丁美洲西班牙殖民地各铸局仅铸于1772年之前，而有查理三世(Carolus III)、查理四世(Carolus IV)或费迪南七世(Ferdin VII)等西班牙国王头像的银币则在1772至1822年间铸造。虽然查理三世的银币成色较前稍低，但因其重量(417公克)与合金成分(成色为92%)一直到墨西哥独立都未改变而广受青睐。

18世纪时，英国是将拉丁美洲白银输往中国的最重要欧洲国家。即使1822年墨西哥独立以后，不再铸造有西班牙国王头像的银币，但在1857年以前的美国，这种西班牙银圆还是其法偿货币。1776年美国宣布独立后，开始加入与中国的贸易。根据推测，从中美贸易开始到1833年，美国向中国输出了9000万银圆。^④因为中英、中美贸易的开展，越来越多有着查理三世、查理四世、费迪南七世头像的西班牙银圆流入中国，加上其质地较可靠，这种银在中国流通日广。在中国，查理三世银又

① J. Busschers, *The Mexican Pieces of Eight Reales and Their Dominance in Southeast Asia: An Historic Survey of More Than Three Centuries of A Trading Coin*, p. 56. 另简义雄《台湾钱淹脚目》(2006年自印)第32页指出一般所谓“切钱”，《台湾府志》称之为“方钱”。

②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780页。

③ J. Busschers, *The Mexican Pieces of Eight Reales and Their Dominance in Southeast Asia: An Historic Survey of More Than Three Centuries of A Trading Coin*, pp. 48, 55—56, 58.

④ 小竹文夫(「明清時代における外国銀の流入」『近世支那經濟史研究』弘文堂,1942年,頁67—70)根据美国的统计资料以及马士(H. B. Morse)、赖德烈(R. S. Latourette)和马丁(Robert Montgomery Martin)的研究给出了近1亿银圆的数据。

称三工(Carolus III),查理四世银又称四工(Carolus IIII),工半(Carolus IV)。^①这种银上面的西班牙国王头像,曾被称为“鬼面”“番面”,后来被称为“佛头”,参见图2。^②乾隆末年和嘉庆时期,“佛头”超过其他银圆而最受欢迎。乾隆初期,外国银圆在福建和广东两省越来越被广泛使用。闽粤地区以外,即使是江浙地区,在1770年以前也非常少用外国银圆,但在1780年后,“但用佛头一种,后以携带便易故,相率通用,价亦渐增,苏城一切货物,渐以洋钱定价矣”。黄爵兹解释道光时期各省都用银圆缴纳赋税的原因在于:“市民喜其计枚核值便于运用。”^③外国银币流入中国后,百姓以其成色固定易认,按其形圆而称其单位为“圆”。又因近代“圆”与“元”读音相同,所以民间逐渐以“元”代“圆”,是故“银圆”“壹圆”皆可写做“银元”“壹元”。^④郑永昌也指出:约由1750年前后起,台湾所使用的西班牙银圆的单位,有从较多使用“秤量”的“两”转为较多使用“计量”的“圆/元/员/个”的转折。^⑤民间契约称“佛银”等外国银圆的单位为“圆(元)”,参见表2。

表2 力力社古文书有关佛银之表述(以嘉庆朝为例)

时间	出现佛银情况	古文书性质	对应页码
嘉庆元年(1796)	佛银三十五大元	找洗契	446
嘉庆三年	时价佛银三十八大员折重二十八两八钱八分	典契	404
	佛银五员	找贴契	485
嘉庆四年	时价佛银二十五大元	典契	293
嘉庆六年	佛银三大员	典田租字	486
嘉庆七年	时价佛银二十二大员	转典契	276
嘉庆九年	时价佛一百三十大元	找典契	100
嘉庆十年	佛银九十大元	卖杜绝契	496—497
	佛银四大元	找贴契	498—499
嘉庆十一年	时价佛银一百九十五大员	杜绝尽根卖园契字	540
嘉庆十五年	时价佛银二百七十五大员	卖尽契	206
嘉庆十六年	时价佛银四大员	典契	176
	佛银一百大员	卖杜绝契	500—501
嘉庆十七年	时价佛面银四百五十大员	典契	88
嘉庆十八年	时价佛银一百九十五大元	杜绝尽根卖契字	541
嘉庆二十一年	时价佛银十大元	典契	61
	时价佛银一百大员	典契	200
	时价佛面银二百七十五大元	杜绝卖尽根契	258
	时价佛银一百八十大员折重一百三十六两八钱	典契	261
	时价佛○宅三十大元	典契	293
	时价佛银十大元	典契	295
	时价佛银一百大员	典契	330
	时价佛面银二百七十五大元	杜绝卖尽根契	388—389
	时价佛银一百八十大员折重一百三十六两八钱	典契	391
	时价佛银五十二大员	典契	430
	时价佛面银十八大员	典租粟契	440

^① Carolus III 及 Carolus IV 并出,是当西班牙国王于1788年由 Carolus III 转为 Carolus IV 时,因为西班牙美洲殖民地的银圆铸模是由母国提供,当殖民地还没有收到 Carolus III 铸模时,先将 Carolus III 铸模转为 Carolus IV 铸模使用,等 Carolus III 铸模于1790年到达时再用新模。Carolus IV 铸模上仍为父王 Carolus III 头像,Carolus III 铸模上则为嗣王 Carolus III 头像。参见 J. Busschers, *The Mexican Pieces of Eight Reales and Their Dominance in Southeast Asia: An Historic Survey of More Than Three Centuries of A Trading Coin*, p. 56.

^② 关于清初及18世纪流入中国之银圆的形制,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661—663、780—783页)中有很生动的介绍。

^③ 林满红:《银线》,第39—42页。

^④ 张翰中:《战后初期台湾货币改革之研究》,第11页。

^⑤ 郑永昌:《清代前期台湾货币流通的发展与演变(1684—1800)》,《故宫学术季刊》(台北)第19卷第1期(2001年)。

续表

时间	出现佛银情况	古文书性质	对应页码
嘉庆二十二年	时价佛银二百一十大元	转典契	248
	佛银三大员	赠契	287
	时价佛面番头银九十大员	杜卖	301
	时价佛银二百一十大元	转典契	379
	佛银三大员	赠契	421—422
	时价佛银三百三十大员	杜绝卖契字	533
嘉庆二十三年	时价佛银十大员	典厝地契	77
	时价佛银八十五大元	典田契	504—505
嘉庆二十四年	时价佛银十六大元	典契	64
嘉庆二十五年	佛银六十二大元	典契	97

资料来源：根据陈纬一、刘泽民编《力力社古文书契抄选辑》（南投：台湾文献馆 2006 年版，第 61—547 页）相关数据整理。



图 2 被称为佛银的西班牙银元

资料来源：简义雄，《台湾钱淹脚目》，第 65 页。

在“佛头银”上不断加上中国银号的钢戳，说明中国人对这种银圆的喜爱。这项习惯的起源，据道光年间在中国的英国人卫三畏（S. W. Williams）所言，是由于 1799 年西班牙与英国的战争导致伦敦的西班牙银圆短缺。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广州由一个中国商人仿制该银圆，结果其成色与重量远不如真正的西班牙银币，致使民间流通真币时，需要经手银号加上该银号钢戳，以证明其为真币。一再加上钢戳，使真币成为“烂版”之后，民间仍然珍爱这种银币。^① 周腾虎也在 1887 年以前说出“佛头银”在乾隆嘉庆年间之后，即使成为“烂版”仍备受喜爱的情况：

江浙行用佛头洋银，制自大西洋之西班牙国。西班牙灭小西洋之吕宋国，故俗又呼之为大吕宋。乾嘉之时，其国在广东贸易颇盛，故其洋银流入中国最广，中国因习用之。后其国衰微，且所铸洋银已换新式，佛头银已于道光初年停铸，所来中国洋银，愈用愈少。闽广各省，必椎烂用之，日见其绌。江浙商民，乐其便易，市井贸易，惟此信行。各钱店认定式样，少有更变，则群起而叱为伪铸，巧立各种名目，以抑勒民伍。至每圆洋银，竟贵纹银一两之多，出则呼为净光，入则苛为烂板，转移之间，银已八折。^②

① J. Busschers, *The Mexican Pieces of Eight Reales and Their Dominance in Southeast Asia: An Historic Survey of More Than Three Centuries of A Trading Coin*, pp. 60—61. 美国学者万志英（Richard von Glahn）强调道光银贵来自中国内部对佛银的迫切需要（参见 Richard von Glahn, *Fountain of Fortune: Money and Monetary Policy in China, 1000—170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 pp. 256, 302），由其记载可见，这种迫切需求来自物以稀为贵，在可资信赖的货币短缺的情况下，人们更迫切追寻可资信赖的货币以确保其财富。这项需求主要建立于 18 世纪，而 19 世纪上半叶这项需求的增加首先来自供给的短缺。林满红《银线》第 62 页注 103 指出在嘉庆道光年间，当中国因佛银短缺在迫切追寻佛银时，西方也在增加对佛银的需求。咸同以后，佛银需求仍在，但因白银回流，银贵钱贱现象也获缓解。由这些变化可见供给面对嘉道银贵的影响。

② [清]周腾虎：《铸银钱说》，[清]盛康编：《皇朝经世文续编》卷 85《户政三十·钱币上》，思补楼光绪二十三年刻本。

台湾大学所藏明清档案及与台湾有关的古文书数据库相应文件显示,其所用有“银”的名称的银圆总数为 11 579 笔。其中,称“佛银”(含“佛面银”“佛银”“佛头银”“番佛银”“佛番银”“清水银”,即“净光银”)者 9 127 笔,称“番银”者 866 笔,称“龙银”者 842 笔,称“剑银”者 210 笔,称“花边银”者(含“花银”“灼银”)76 笔,称纹银者 301 笔,称“六八银”(成色为 68% 之银)者 157 笔,可知称“佛银”者占总数之 78.82%。其主要出现时间为乾隆末年到光绪末年。^①

五、清季中国的仿铸银圆及纸币没有领袖头像

从鸦片战争前后到 1911 年辛亥革命之间,中国开始希望铸造与“佛银”类似的中国银圆,但有趣的是:在这个过程中,银圆逐渐改用希腊、罗马的打压式铸造,货币单位也渐由“两”转为“圆”,但一直没有将国家领袖的头像置于银圆上面。

鸦片战争前后的学者官员从民族主义动机出发,提出中国自己铸造银圆的主张,其所建议的银圆外观有圆形方孔、圆形无孔、动物图纹等图案设计。^② 清代后期,清政府从国外购买造币机器,开始了自己铸造银圆的历史。所铸银圆或圆形无孔、或有动物图纹、或以与“佛银”一样的“圆”为单位;有时还有与“佛银”一样的西方文字与圆、角、分的十进制单位,以及人物头像,但就是没有像“佛银”一样的国家领袖头像。

中国最早于 1884 年用机器铸造的银圆一共有 5 种,即 1 两、7 钱、半两、3 钱、1 钱。其上面有“吉林广平”字样,背面有“光绪十年(笔者注:1884)吉林机器局监制”字样。^③ 1887 年初,两广总督张之洞上奏要求设立钱局,并获得批准。张之洞向英国购买机器,在广州大东门外黄华塘建造厂房,1889 年钱局竣工,定名为广东钱局。1890 年,附设于广东钱局内的银厂开始铸造银圆。^④ 1895 年,清廷下令各地开铸银圆,北洋机器局用该局机器加以改造。^⑤

1900 年八国联军入侵,北洋机器局破坏殆尽。1901 年主管北洋事务的李鸿章病亡,继任的袁世凯筹办北洋铸造银圆总局,铸造银圆和铜圆(元)。1903 年,另有天津造币总厂成立,该厂委托美国常生厂代铸光绪元宝银币,用两、钱、分制,后又铸造了元角制的银币,这些货币均为流通币。1906 年该厂先后改名,其所铸银币是辛亥革命之前中国流通最广的银币之一。1910 年,清政府下令将银圆铸造权收归中央,由户部造币总厂颁发祖模,分发各厂铸造银币。与此同时,度支部颁布“币制则例”,规定大清银币实行元角制。^⑥ 由此,圆正式由中国官方采纳为货币单位。有关圆的货币单位:1 圆银币,重库平 7 钱 2 分,1 圆为 10 角,1 角为 10 分,1 分为 10 厘。^⑦ 同年,清廷也公布了“厘定币制拟定则例”与“兑换纸币则例”,规定大清银币的统一形式是“一圆银币一面铸龙纹,一面铸大清银币一圆字样”,取消之前“库平七钱二分”或是“一两”的字样。^⑧ 这些银圆中间没有方孔,重量为库平 7 钱 2 分,与“佛头银”相同,银圆上也有 One Dollar 的西方文字。相对于“佛头银”有狮子图案,中国银圆有了龙的图案,但就是没有国家领袖的头像。

圆形无孔的硬币在清末的发展,还表现在铜圆的铸造上。由于使用机器铸造制钱时,如果有

^① 项洁、翁稷安:《多重脉络——数位档案之问题与挑战》,项洁编:《数字人文要义:寻找类型与轨迹》,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 2012 年版,第 51—53 页图 8。台湾大学数字典藏研究发展中心网站 <http://www.digital.ntu.edu.tw/>,台湾历史数字图书馆 <http://hdl.ntu.edu.tw/>,2016 年 12 月 2 日。

^② 林满红:《银线》,第 198、199 页。

^③ 戴建兵、盛观照:《中国历代钱币通鉴》,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84 页。

^④ 戴建兵、盛观照:《中国历代钱币通鉴》,第 100 页。

^⑤ 戴建兵、盛观照:《中国历代钱币通鉴》,第 85—86 页。

^⑥ 戴建兵、盛观照:《中国历代钱币通鉴》,第 85—87 页。

^⑦ 《政治官报》“折奏类”,宣统二年四月十七日第 922 号,《币制则例》,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编:《清末官报汇编》第 75 册,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2006 年版,第 37433 页。

^⑧ 张翰中:《战后初期台湾货币改革之研究》,第 11 页。

方孔,还需要安装挺杆进行打眼,使机器的磨损很快,工匠们就开始铸造一种和当时的当十大钱大小相近、而中间又没有方孔的铜圆,这种铜圆获得了商民的欢迎。不仅中央政府铸造,各省也开始铸造。^① 这些铜圆也有龙的图案,但仍没有国家领袖的头像。

纸币部分,1888年汇丰银行所印纸钞仍以“两”为单位,1897年则以“圆”为单位,且在纸钞中央直接印上一个银圆,似乎在强调该纸钞之币信一如该银圆。在20世纪第一个10年,中国的纸币大多在纸钞彰显银圆的文字或图案。^② 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是世界上货币需有金属作为本位学说的最高峰,该学说与相关制度直到1905年克纳普(George Friedrich Knapp)发表货币国定说(state theory of money)而渐起变化。克纳普的主张,与不兑换纸币(inconvertible paper money)有相同的论据。^③ 在1904年中国第一家国家银行——户部银行成立后,邮传部又于1908年成立了交通银行。^④ 1910年公布“厘定币制拟定则例”与“兑换纸币则例”,并特许由户部银行改名的大清银行所发行之纸币与银币相辅相行。^⑤ 大清银行所发行之纸币包括银圆票,即银圆兑换券。进入民国后,大清银行改组为中国银行,后者发行的兑换券,是中国近代史上行使最久、发行量最多的一种纸币,长期居于国币地位,被中央政府列为主币之一。^⑥

在大清银行所印的纸币上,印有溥仪的父亲醇亲王载沣或李鸿章或黄帝的头像。^⑦ 这是货币图案开始有人物头像之跃进,但这些人物还不是“佛头银”上面的国家领袖。在由广东开始、各省跟进铸造银圆的潮流中,四川也于1898年在其省城成都买入铸造银圆的机器。在初铸品不受欢迎之后,四川总督草率地将印度银币上的维多利亚女王改为光绪皇帝,并将“one rupee India”改成“四川省造”来充当银圆流通市场。出于四川相对于中央政府的自主发展,这种银圆在1902—1903年间开始铸造之后,一直被用至1938年。^⑧ 虽然光绪皇帝是国家领袖,但因为是地方政府将外币改造而成,并非如“佛头银”那样是由一个国家的中央政府主动铸造,因此直到1912年中国由中央政府铸造的货币,不像西方那样有国家领袖头像。当有着西班牙国王头像的银圆在中国流通时,中国称之为“佛银”“佛头银”“佛面银”“佛面番头银”等(本文有时统称为“佛银”),其象征意义值得进一步探究。

六、“佛头银”等背后的文化意涵

曾做过举人、省级官员的幕僚和知县的包世臣于1837年说:“民间买卖书券,十八九亦以银起数。”^⑨ 从近年来清代台湾民间买卖契约的大量汇编中可以看出,包世臣所说的银,如果是银圆,而且是以“银”称呼的话,还主要以“佛头银”“佛面银”“佛银”称呼,参见图3。

台湾民间所用银圆,康熙、雍正年间偶而也有“佛头银”或“佛银”的称呼,显然是指从荷兰等

^① 戴建兵、盛观照:《中国历代钱币通鉴》,第83页。

^② Jennifer Purtle, “Money Making Nation: Picturing Political Economy in Banknotes of the Qing—Republican Transition”, in Jennifer Purtle and Hans Bjarne Thomsen, *Looking Modern: East Asian Visual Culture from Treaty Ports to World War II*, Chicago: Center for the Art of East Asia, Art Media Resources, 2009, p. 113.

^③ 张翰中:《战后初期台湾货币改革之研究》,第28—29页。

^④ [美]费维凯著,林载爵译:《中国近百年经济史》,台北:华世出版社1978年版,第62页。

^⑤ 戴建兵、盛观照:《中国历代钱币通鉴》,第11页。

^⑥ 戴建兵、陈晓荣:《中国纸币史话》,第40—41页。

^⑦ Beith E. Notar, “Viewing Currency Chaos: Paper Money For Advertising, Ideology, and Resistance in Republican China”, in Terry Bodenhorn, *Defining Modernity: Guomindang Rhetorics for a New China, 1920—1970*, Ann Arbor: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2002, pp. 123—149, 134—135.

^⑧ Richard N. J. Wright, Joe Cribb and Helen Wang eds., *The Modern Coinage of China 1866—1949: The Evidence in Western Archives*, London: Spink, 2012, pp. 36—38.

^⑨ [清]包世臣:《安吴四种》卷26,《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294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年版,第11页a。

欧洲国家流入的铸有头像的银币,但数量极少,且与 1772 年至 1822 年间墨西哥所铸的西班牙银圆不同。^① 1775 年以后,银圆的这种称呼显著增加。

在今天台湾屏东的潮州镇与崁顶乡,清嘉庆年间由福建永春迁到该地平埔族力力社居住的陈家,留下土地买卖与金钱借贷等古文书契 388 则。其中契文内有“佛银”者 195 则,有“佛面银”者 22 则,有“佛面番头银”者 1 则,有“剑银”者 5 则,有“花边银”者 2 则,有“双柱银”者 2 则,有“清水银”(非“烂版银”)者 1 则,有“洋银”者 7 则。在这些有“银”称呼的外国银币中,“佛银”占 82.97%,“佛面银”占 9.36%,“佛面番头银”占 0.42%,三者共占 92.75%。出现“佛银”“佛头银”“佛面番头银”的契文占所有契文的比例为 56.17%,参见表 2。其中按朝代的顺序来看,乾隆朝 3 则,皆为“佛银”;嘉庆朝 36 则,当中“佛银”31 则,“佛面银”4 则,“佛面番头银”1 则;道光朝 78 则,当中“佛银”67 则,“佛面银”11 则;咸丰朝 8 则,当中“佛银”6 则,“佛面银”2 则;同治朝 20 则,皆为“佛银”;光绪朝 18 则,皆为“佛银”;明治年间 1 则,为“佛银”,参见表 3。

表 3 力力社古文书出现佛银情况(年代别)

时期	佛银	佛面银	佛面番头银
乾隆朝	3	0	0
嘉庆朝	31	4	1
道光朝	67	11	0
咸丰朝	6	2	0
同治朝	20	0	0
光绪朝	18	0	0
明治年间	1	0	0

资料来源:据陈纬一、刘泽民编《力力社古文书契抄选辑》(第 61—547 页)相关数据整理。

除力力社文书之外,如与已出版的其他台湾南北 6 个地方古书契做类似统计后加总,得到表 4 和表 5。由表 4 可知,道光年间使用“佛银”(包括“佛头银”“佛面银”等)从事经济交易者最多,其次为光绪年间,再次为同治年间,第 4 位为嘉庆年间,第 5 位为咸丰年间,第 6 位为乾隆年间,第 7 位为明治年间。由表 5 可知,使用“佛银”交易书契约占使用有“银”称呼的外国银币交易书契的 96.90%,约占书契总数的 43.99%。由此可更仔细地看到“佛银”等称呼在经济交易相关文书中的运用情形。

表 4 “佛银”等称呼于各地古书契中出现之次数统计

年代	地区						总计
	力力社	古凤山县	大岗山	苑里	大甲	新竹	
乾隆朝	3	1	6	7	1	2	—
嘉庆朝	36	2	25	38	12	13	1
道光朝	78	2	41	77	44	70	5
咸丰朝	8	1	15	42	19	6	4
同治朝	20	5	9	46	37	10	4
光绪朝	18	1	29	97	98	15	9
明治年间	1	1	3	n/a	9	1	1
总和	164	13	128	307	220	117	24
							972

^① 郑永昌:《清代前期台湾货币流通的发展与演变(1684—1800)》,《故宫学术季刊》(台北)第 19 卷第 1 期(2001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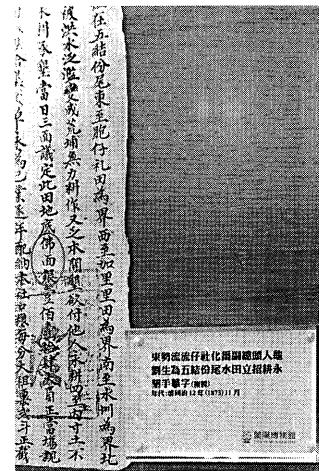


图 3 清代招垦单上的佛面银

资料来源:2015 年 9 月 27 日
作者摄于宜兰兰阳博物馆。

表 5

使用“佛银”交易书契之占比情形

	力力社	古凤山县	大岗山	苑里	大甲	新竹	关西坪林	总计
使用外国银币书契总和	235	17	143	311	227	127	—	1 060
使用佛银书契占比(%)	90.60	76.47	89.51	98.71	96.92	92.12	—	96.90
书契总数	388	110	259	800	336	350	105	2 348
使用佛银书契占比(%)	42.26	11.81	49.42	38.50	65.77	33.42	22.85	41.39

资料来源：参见刘泽民编著《大甲东西社古文书》，南投：台湾文献馆 2003 年版，第 203—560 页；陈秋坤、蔡承维编著《大岗山地区古契约文书汇编》，高雄县政府 2006 年印行，第 38—547 页；唐荣源编著《古凤山县文书专辑》，高雄市文献委员会 2004 年版，第 1—114 页；萧富隆、林坤山编著《苑里地区古文书集》，南投：台湾文献馆 2004 年版，第 157—852 页；郑华生口述，郑炯辉整理《新竹郑利源号典藏古文书》，南投：国史馆台湾文献馆 2005 年版，第 87—413 页；刘泽民编著《关西坪林范家古文书集》，南投：台湾文献馆 2003 年版，第 79—264 页；陈纬一、刘泽民编著《力力社古文书契抄选辑》，第 61—547 页。

以“佛银”“佛面银”“佛头银”“佛番银”“佛面番头银”来称谓有西班牙国王头像的银圆，把西班牙国王头像称为“佛头”或“佛面”，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有何深刻意涵？普通百姓如何建构他们视觉世界中有关“佛”“佛头”“佛面”的意象？

先说明极具视觉震撼力的佛像雕塑的起源。据李玉珉研究，早期印度艺术是“无偶像”的，所以在早期的佛教艺术里，常以佛足、佛座、菩提树、法轮、佛塔等象征物来代表佛陀。纪元前后，印度艺术开始进入偶像时代。因亚历山大征服印度之后早逝，由其留下来的部将所建立的王朝影响当时的印度，加上印度本土文化的自生发展，出现了许多佛陀、菩萨、观音的雕刻。其后佛像雕塑种类增多，组合也越来越复杂。^①

中国宗教雕塑的起源甚早，新石器时代即有宗教雕塑的制作。纪元前后，大约在中国进入东汉时期，佛教传入中国，佛教艺术随之由 3 条路线传入：(1)由东印度经海路传到中国东南沿海及长江下游地区；(2)由印度东北，经缅甸至云南，北入巴蜀、汉中地区；(3)自印度中部、西北部，经中亚丝路，东入黄河流域及中原地区。^② 然而佛教在汉代仍属于萌芽阶段，宗教雕塑处于中国雕塑的次要地位。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势力的蓬勃发展，宗教活动频繁，佛寺林立，佛教雕塑数量激增，成为中国雕塑的主流。两晋南北朝的石窟雕塑以及金铜造像皆为其例。其造像各地风格面貌不一，各成体系，或作汉式佛像，或西域色彩浓郁。^③ 据刘淑芬研究，除重要庙宇之外，山西、山东一带在北朝时期已有村庙建造佛像。^④ 2015 年 11 月 19 日笔者参观华东师范大学博物馆，其中有合家供奉的北齐与隋朝的佛像。北齐佛像下刻“左平六年四月廿五日佛弟子贾腺敬作石一尊。今得成龛合家供养佛”。隋朝佛像下刻“大业四年六月廿三日弟子马郭奴为七世父母是马文通回眷属阿弥陀佛区所生”。往后的朝代里，一些信徒家中也供奉佛像，例如在明代居士家里的佛室中，有释迦、文殊、普贤或观音等造像。^⑤ 根据阿部贤次(Stanley Kenji Abe)的研究，从 18 世纪下半叶开始，中国的古董市场上出现了很多用青铜、玉或石刻的小佛像。相对日本有较多大型佛像流入西方博物馆，1845 年以后流入西方博物馆的中国佛像大多为小佛像。^⑥ 小佛像的流播也使佛的视觉意象更能普及民间。

除了佛像雕塑之外，中国传统的庶民大抵还可透过以下方式目睹佛的图像：

第一，市集中用来解说佛教故事的图画。梅维恒(Victor H. Mair)指出，印度原有游走于各市集间、看图述说佛教故事的人，在这些图画当中会有佛像。随着佛教由印度传入中国，这种民间习俗也

① 李玉珉：《神佛的世界》，收入冯明珠主编：《佛陀形影》，台北故宫博物院 2011 年版，第 7—8 页。

② 李玉珉：《北魏的造像》，收入冯明珠主编：《佛陀形影》，第 177 页。

③ 李玉珉：《中国宗教雕塑概论》，收入冯明珠主编：《佛陀形影》，第 157—158、159、175 页。

④ 刘淑芬：《五至六世纪华北乡村的佛教信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辑委员会编：《“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63 本第 3 分，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93 年印行，第 506—522 页。

⑤ [明]文震亨著，海军、田君注释：《长物志图说》，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427—428 页。

⑥ Stanley Kenji Abe，“Moving Buddha: Chinese Sculpture and Global Modernity”，台湾师范大学美术系演讲，2013 年 5 月 14 日。

在中国各地流播,甚而延续到今日台湾。^①

第二,单独发行的纸本佛像。玄奘于629年游印度,645年回国以后用纸印普贤菩萨像。敦煌发现的五代单幅大张普贤像与文殊观音像,可能与玄奘所印的相似。^②直到1936年范古农写《古农佛学答问》,还在讲应以何种相对位置在家中悬挂释迦、弥陀、药师、观音、地藏等圣像。^③柯律格(Craig Clunas)从《金瓶梅》的插图看到潘金莲的屋内挂着观音图像。在女性屋内挂观音图像,在明代还甚流行,男士也有这种情况,但如想跻身士林,便要较少悬挂。^④

第三,经书、咒文或宗教小说上的佛像。唐代无论官方或民间,都笃信佛教。在玄奘之后,民间有很多以抄写经书为职业的人,因为抄写麻烦,有人用新的雕版技术来扩大流通。唐代成都龙池坊印卖的咒本,约1尺见方,大部分是古梵文,中间与四周各有小佛像,与宋初所刻《大随求陀罗尼经》相似。敦煌发现的868年印造的《金刚经》,卷首即有释迦牟尼佛的座像。雕版印刷术约于唐代发明之后,佛教徒认为印刷佛教经像是大功德,不只是民间私人印刷,主政者更是大量刊印。^⑤而就中国印刷术的发展而言,文字雕版于盛唐发展之后,至宋代已达巅峰状态,但图像雕版要到明末才达到巅峰。明末以后的人因而有更多机会看到印刷的佛像图画。^⑥虽然有些学习儒家思想的士人有排佛的思想,但士人有时也安排或参与消除疾病、死亡等业障的念经忏悔仪式,其中也有与佛教相关的图像。^⑦宗教小说《全像观音出身南游记传》由福建焕林堂于1571至1602年间刊行,并以极简单的观音图像流通民间,读者也有男性。^⑧

第四,佛教做功德仪式中盖了很多佛像的印,用以避邪。^⑨

日本割占台湾时期,草屯一间小学用佛像雕塑出身贫寒、但经苦读而成为重要政界人物的二宫金次郎,^⑩可见佛像是东汉以后的传统中国形塑外来人物、而不只是西方人物样貌的重要依据。中国所流通的大乘佛教,有各种菩萨作为释迦佛的化身以普渡众生。究竟“佛银”“佛面银”“佛头银”中的佛是指哪一尊佛?其实并不可考,但一些蛛丝马迹让人认为观音菩萨是最有可能的。就造形而言,在传统中国流通的观音像(参见图4),与“佛银”“佛面银”“佛头银”上的查理三世、查理四世、费迪南七世等最为接近。更重要的是,据马凯文(Kevin McLoughlin)研究,虽然从16世纪末以来,观音图像已渐由男身转为女身,到17世纪末出版的观音,在不同救难场合现身的53种形象图录中仍有许多幅是为男身。其中的西洋观音像还与西班牙和英国博物馆所藏的法王路易十三的画像非常接近,并有类似英国所藏路易十三像一样的欧洲式花圈围绕在头像之外,参见图5、图6。以慈悲为怀的观音大士在不同现身场会有不同称呼。在《观音经》卷3中,有关观音



图4 清代台湾家庭客厅的观音画像

资料来源:作者2013年7月27日摄于彰化县马鸣山陈家清代古宅。

^① [美]梅维恒(Victor H. Mair)著,王邦维、荣新江、钱文忠译:《绘画与表演:中国的看图讲故事和它的印度起源》,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版,第1、8—9、11—13、16、29、162、163、267页。

^② 张秀民:《中国印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4页。

^③ 范古农:《古农佛学答问》卷4,北京:黄山书社2006年版,第150页。

^④ Craig Clunas, *Pictures and Visuality in Early Modern China*, London: Reaktion Books, 1997, pp. 163—164, Pictures 83—85.

^⑤ 张秀民:《中国印刷史》,第31—32页。

^⑥ 张敦智:《清代民间雕版印刷纸币种类及编排分类之研究》,《台湾古文书学会会刊》(台中)第10期(2012年4月)。

^⑦ 陈玉女:《明代佛门内外僧俗交涉的场域》,台北:稻乡出版社2010年版,第443、450页。

^⑧ Craig Clunas, *Pictures and Visuality in Early Modern China*, pp. 163—164, Pictures 83—85.

^⑨ 黄士珊:“中古佛教木刻的文化流变:一个视觉研究的新视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演讲,2015年12月7日。

^⑩ 耿诗婷、李宛儒:《秋惠文库宛如台湾文物宝殿》,《书香远传》(台中)第88期(2011年9月)。

的一个称呼为“小王”，而观音也称“佛”。没有其他菩萨有像观音菩萨那样，以不同的现身在不同的场合普渡众生。^①也由于观音的形象多变，在清代的庶民看来，像法王路易十三一样，查理三世、查理四世、费迪南七世的头像是观音的另一种形象是可能的。1896年11月台湾关西坪林范家地契上有“胎借‘佛母银’一千大员正”，^②或许是传递了相关信息。

“佛郎机”或称“佛朗机”“佛狼机”（为行文方便，以下统称“佛郎机”），关于该词汇之使用状况，以下将依据明朝与清朝文献分别进行探讨。为研究方便，将试着先以“佛郎机”一词，对《明实录》^③、陈子龙等选辑《明经世文编》^④、王圻纂辑《续文献通考》^⑤等加以考察，并制成表6。其中，“武器”一项乃指文献中有“佛郎机铳”“佛郎机锐”“佛郎机炮”“佛郎机快枪”等词语；“国名”一项乃指文献中有“佛郎机番人”“佛郎机国”等，或其他由前后文可知形容人群、国家者，如文献中提及佛郎机时，常形容其为“澳夷”，便可知其为葡萄牙人；其余无法确知者单列一项。

表6

明朝书籍中的“佛郎机”

资料来源	指涉意义	出现次数			
		个别	小计	总计	
《明实录》	武器(大炮、火炮、火铳等)	24	24	33	
	国名	6	9		
	无法确知(前后文不足)	3			
《明经世文编》	武器(大炮、火炮、火铳等)	15	15	23	
	国名	0	8		
	无法确知(前后文不足)	8			
《续文献通考》	武器(大炮、火炮、火铳等)	9	9	12	
	国名	3	3		
	无法确知(前后文不足)	0			

资料来源：根据《明武宗实录》《明世宗实录》《明穆宗实录》《明神宗实录》《明熹宗实录》《明经世文编》《续文献通考·兵考》《续文献通考·物异考》《续文献通考·四裔考》相关资料整理。

根据表6的统计，在《明实录》33笔数据之中，武器类者占24笔，远多于国名类的9笔，《明经世文编》与《续文献通考》也有相同情形。如果将其全部加总共68笔，武器类48笔占总数的70.59%，国名类20笔占总数的29.41%；若再将国名类20笔加以细看，可知其指涉葡萄牙者为9笔，无法确知何国者为11笔，两者几乎相当。因此，明代文献中，佛郎机一词大多指涉武器，而若指涉国名，一



图5 慈容五十三现象赞中的西洋观音



图6 马德里普拉多博物馆藏的法王路易十三画像

资料来源：参见 Kevin McLoughlin, “Appropriation, Representation, and Efficacy”, pp. 236, 237. 由 McLoughlin 博士提供。

^① Kevin McLoughlin, “Appropriation, Representation, And Efficacy: Three Case Studies of the Bodhisattva Guanyin in 17TH and 18TH Century Chinese Print Culture”, Ph. D. thesis, University of Sussex, 2005, pp. 21, 51, 227–239, 349, 351–353.

^② 刘泽民编著：《关西坪林范家古文书集》，第215页。

^③ 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66 年版。

^④ 北京：中华书局 1962 年版。

^⑤ 台北：文海出版社 1979 年版。

般可明知者为葡萄牙。

清代部分的经世文编类书籍,因有“佛郎机”一词的资料笔数不多,故将其合并统计于表7。而且该词实际使用情况较明代复杂,故表7较表5新增“法国”“确知为混用”“无法确知(非混用)”3个选项:第一个表示文献中“佛郎机”指称的是法国(法兰西);第二个是可用以泛指洋人;第三个则是指个别国家,但因前后文不足,难以判定为何国。

表7 清代经世文编类书中的“佛郎机”

指涉意义		出现次数		
		个别	小计	总计
武器(大炮、火炮、火铳等)		9	9	
国名	葡萄牙	5	20	29
	法国	7		
	确知为混用	2		
	无法确知(非混用)	2		
	无法确知(前后文不足)	4		

资料来源:根据贺长龄编《皇朝经世文编》(广百宋斋光绪十七年校印本)、饶玉成编《皇朝经世文编续集》(光绪八年补刻续编江右饶氏双峰书屋刊本)、葛士浚编《皇朝经世文续编》(上海:广百宋斋光绪十七年排印本)、陈忠倚编《皇朝经世文三编》(光绪二十七年上海书局石印本)、邵之棠编《皇朝经世文统编》(光绪二十七年宝善斋石印本)、何良栋辑《皇朝经世文四编》(光绪二十八年鸿宝书局石印本)、于宝轩编《皇朝蓄艾文编》(光绪二十九年上海官书局铅印本)相关资料整理。

根据表7统计结果,全部资料共29笔,其中武器类9笔,占总数之31.03%;国名类共20笔,占总数之68.97%。细探国名类内部情况,指涉法国者最多,共7笔,占国名类总额之35%,其后依序是葡萄牙的5笔(25%)、“无法确知(前后文不足)”类4笔(20%)、“确知为混用”与“无法确知(非混用)”皆2笔(各占10%)。因此清代文献中的“佛郎机”,用以作为武器者仅不到国名者的一半,而用以指国名的情况也十分纷杂,指涉法国者尽管最多,但仍不及一半,且用以泛指外国人的的情况也是较少见的。

就明清两代相比较,明代“佛郎机”一词主要用来指武器,而清代主要用来指国名;在明代“佛郎机”一词约略少于一半的情况是指葡萄牙人,而清代则无定则,但指涉法国者已成为首位,指涉葡萄牙者也不少。整体来说,“佛郎机”一词并不常如若干网络上所说是西班牙或西洋人之泛称。就“佛银”以外其他银币的称呼而言,都以其形象命名,而未以国家命名。例如,来自荷兰被称为马剑银的银圆,是因为其正面图案为手持宝剑、全副盔甲的骑士。不规则形状、以手工打造的西班牙银圆被称为“锄头锲仔银”,因其形状像闽南固定锄头的锲仔。1732年西班牙采用新型造币设备铸造银圆,因有双柱代表的直布罗陀海峡,双地球代表西班牙帝国统治区有东半球的部分也有西半球的部分,此币在中国称“双柱双地球银币”,因其有防伪花边,亦被称为“花边银”。^① 1823年以后墨西哥政府铸造的银圆,中文称“鹰洋”,因为其银圆底面铸有一只嘴中衔着一条蛇的老鹰站在仙人掌上,这是墨西哥共和国的国徽。这种情形也如胡适读《病榻梦痕录》时记到:一块本洋一柱的换多少钱,二柱、三柱的又换多少钱,对一柱、二柱、三柱等名目,并不清楚。经卫挺生研究后才向他说:书中所谓一柱、二柱、三柱就是罗马字的I、II、III,是西班牙皇帝一世、二世、三世的标记;中国当时不认识这种字,就叫其一柱、二柱、三柱。^②

荷兰、西班牙、墨西哥是一般清朝的庶民无从知晓的概念,因而未出现在银币的名称上。诸联在其于1821年出版的《明斋小识》中,也是依循民俗,以形象称呼银圆。^③ 银圆名称当中,固然有用“番”字泛指西洋人或外国人,但在“佛番银”“佛面番头银”这些称呼当中,如果“佛”又指西洋或西班牙,就会有“西洋人外国人”或“西班牙外国人”的词语重复。将“佛”解释为“佛祖”,那么银圆名称的

① 房地契博物馆,<http://blog.sina.com.cn/qtqw123>,2016年12月2日。

② 《胡适演讲集(一)》,台北:远流出版社1986年版,第210—211页。

③ [清]诸联:《明斋小识》卷12《言钱》,道光十四年序刊本。

“佛面”“佛头”“佛母”也较可解。

1844年广东人梁思泽出版了一本协助辨别伪币的《银经发秘》，其曰：“各银面上花草名目凡万字边银。其宝盖顶为葫芦顶。宝盖内之花为牡丹花。宝盖之下为香炉。香炉内有狮子二只。城楼二座。香炉两边有烛台。烛台之身有缠带。缠带之上有小鬼字。烛台之外是鬼字脚。鬼字侧之圆星为间珠。鬼字顶之外是栏牙。鬼头后枕之带为扎带。鬼身上所着之衣。如大过鬼头者为大衣。细过鬼头者为小衣。”^①虽然这枚银币上的西班牙国王被称为“鬼头”，而非“佛头”，但此文句中的“万字”“香炉”“烛台”，与“鬼头”“佛头”等一样，都是民间宗教的语词。由“鬼头”转为“佛头”，可能与人们对此种银币的喜好有关。“市民喜其计枚核值便于运用”，以及“江浙商民，乐其便易，市井贸易，惟此信行”，都表达了在西方工业产品大量流入中国之前，中国对西方银圆这项工业化产品的心悦诚服。而《银经发秘》仍用“鬼头”，可能与其造成伪币充斥有关。

参酌佛像相对于国家领袖头像在中国传统民间渗透的程度，将“佛面银”“佛头银”“佛母银”“佛银”中的“佛”解释为“佛祖”，有其社会基础。这些证据也可以说明，在传统中国，普通百姓没有机会透过货币看到国家领袖头像，但却有很多机会接触佛像。

七、结论

图像相对文字，原较醒目。在识字率低的时代，图像的社会影响更深。西方有政治领袖头像的货币，虽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用到或看到，但至少有相当一部分人可以看到。佛教进入中国的一个渠道是丝路。西方有政治领袖头像的货币也曾透过丝路流入中国，但没有影响及中国货币图案之采用政治领袖头像。《隋书》(清乾隆武英殿刻本)卷24《食货志》曾记载：“河西诸郡或用西域金银之钱，而官不禁”，伴随丝路贸易流入中国的境外钱币有波斯银币、东罗马金币、阿拉伯金银币及早期贵霜钱币等。^②但在新疆地区，西方有政治领袖头像的货币文化传统却打住了。古代称作“高昌”的新疆吐鲁番地区，位于西域中部偏东，地处丝绸之路交通要道。隋唐之际高昌发行有“高昌吉利”铭文的铜钱，“吉利”是用汉字拼读的古突厥语，意思为高昌王。清朝初期当新疆还在准噶尔统治期间，打制普尔钱，主要流通于天山南路的广大地区及北路的伊犁一带。钱币没有方孔，铭文为阴文(白线)，按自右向左再由上而下的顺序读，为察合台文“Khordan Chirin”，是准噶尔汗噶尔丹策零的名字。1866年在新疆和阗打造的银币，正面为古兰经颂词“Lailaha Illalaha Muhammadum Rasulilla, 1283”(汉译“真主是唯一的，默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回历1283年，即1866年)，背面为察合台文，记打制地点“Zarb Latif”(汉译“打制于清真之地和阗”)。这些都是中国钱币文化与希腊、罗马钱币文化在西域交融的现象。^③就清朝而言，西域与中原较多连结的北疆已行使制钱。北疆地区，西起伊犁，东至哈密，中间包括乌鲁木齐(迪化)、巴奇台(古城)、巴里坤(镇西)等天山北路一线及南路的吐鲁番。北疆的乌鲁木齐一带多为从关内迁来的汉、回等民众，清朝政府设立镇迪道，由陕甘总督及乌鲁木齐都统双重管辖，实行与关内一致的郡县制。^④或因此阻隔，整个中原地区并未受到希腊、罗马文化钱币有政治领袖头像的影响。

相对而言，东汉由印度传入的佛教，对中国人的影响颇为深远。《隋书》卷77《隐逸传》载，曾有人问隋朝名士李士谦三教优劣，士谦曰：“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宋孝宗《原道论》论三教异

^① [清]梁思泽：《银经发秘》，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藏及网上分享，<https://books.google.com.tw/books/about/%E9%8A%80%E7%B6%93%E7%99%BC%E7%98.html?id=p4MpAAAAYAAJ&hl=zh-TW>, 2016年12月2日。

^② 王永生：《钱币与西域历史研究》，第175页。

^③ 王永生：《钱币与西域历史研究》，第3、33、37、44页。

^④ 王永生：《钱币与西域历史研究》，第223、224、226页。

同,以为:“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①刘序枫描绘了18至19世纪因秋冬东北季候风漂流到台湾的朝鲜难民有关台湾的纪录,指出台湾“其俗家家供佛”。^② 同样是公元前1世纪由西域传进的文化,中国深刻吸纳佛教,而未吸纳希腊罗马钱币有政治领袖头像的文化,也可反观中国这个文化受容体本身需要。

中国历代具有道德劝说作用的图画,除了佛像之外,还有孔子及其弟子像、历史故事图说,以及《帝鉴图说》。《帝鉴图说》在明代主要供嗣君在宫中学习,清朝末期才较为大量刊印。^③ 然而这些都不如西方从希腊、罗马时期以来,将君主头像刻在钱币上之较能深入民间。

比较而言,日本吸纳佛教甚深。在1787年出版的《西洋钱谱》中,对17世纪以来西洋银圆上的人像,并无称“佛头”者,但有称“背有云上神母像”“如法师武者的短发半身人物像”“头戴像甲一样的头巾、身穿像袈裟或僧衣的半身人物头”“半面僧官像”者。因为有荷兰人可以询问,对18世纪中国人深为喜好的、有西班牙国王查理三世头像的银圆,日本已知道其为“王面”,只是误以为是法国国王,当然,他们也可以正确地说出法国在德国以西、西班牙以北、荷兰西南。书末更附有欧洲略图,所介绍的西洋钱币也略知其上刻有该国文字,因而对欧洲各国多少有些认识。针对有瑞典国王头像的银圆,亦能具体指出是“王面”。^④ 由此看来,18世纪末的日本,虽然也会用宗教语言来说明西方银币上的人物头像,但相对同时期的中国而言,已知道西方银币上有政治领袖头像。

相对于西班牙银圆上刻有“Del Gratia(蒙神恩典)”,传统中国政府提供的货币并没有与宗教有关的图案,中国民间接触的人像仍以佛像居多。清代的中国人将有西班牙查理三世、四世、费迪南七世头像的银币视为“佛银”“佛面银”“佛头银”“佛母银”“佛番银”“佛面番头银”。道光年间台湾铸造正面有寿星、背面上下左右都刻有满文的台湾府库老公仔银,^⑤都可看到传统中国有关货币的宗教想象。鸦片战争前后的白银短缺时期,建议发行纸币的王瑬希望负责发钞的官员在神前发誓:纸币的价值将不会变动,“欲行钞,必先将条例播告天下,使人人知行钞之利,又誓之明神,永不变法”。^⑥ 美国的纸币上,目前还写着:“IN GOD WE TRUST(秉持对神的信念)”。但在1911年之后,直到今天的新台币与人民币,一直很少出现源自民俗信仰的象征符号。相对而言,继国家领袖头像于1912年出现之后,“中央银行”“中央印制厂”“中央造币厂”“中国人民银行”等国家符号陆续成为中国的货币图案之一。这些都透露出:以国家信仰取代宗教信仰的情况,在民国货币图案中,较诸在西方来得彻底。

在中国历史上,国家原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概念。甘怀真从典籍的考证出发,认为在汉代,国家可以指皇帝本人,也可以是政治团体,特别在“中古时期,以皇帝为首的政治团体,即国家”。^⑦ 清代鸦片战争前后的学者官员通常是用“国家”“国”“上”来指“政府”,而与“天下”或“下”所表达的“社会”是两个对立的概念。^⑧

^① 芮逸夫:《中华民族构成的初步研究》,《中国学术与现代文化丛书:社会学论集》,台北:华冈出版部1977年版,第493页;“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汉籍电子文献数据库”,<http://hanchi.ihp.sinica.edu.tw/ihpc/hanjiquery>,2015年12月1日。

^② 刘序枫:《18—19世纪朝鲜人的意外之旅:以漂流到台湾的见闻记录为中心》,《石堂论丛》(韩国)第55辑,釜山:东亚大学校石堂学术研究院2013年版,第82页。

^③ Julia K. Murray, *Mirror of Morality: Chinese Narrative Illustration and Confucian Ideology*, Ha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7, pp. 17–18, 39, 71, 109, 120–121.

^④ 参见朽木昌綱『西洋錢譜』天明七年群玉堂刊本,頁6a、8a、14、15b、38b、29a、39b、50、21。按:该书为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线装书,由郑永昌先生提供。关于朽木昌綱询问的荷兰人,通过2016年9月7日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东亚各中心所举行百周年纪念会议上何淑真(Lyce Jankowski)教授发表的论文得知,为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德胜(Isaac Titsingh, 1745–1812)。

^⑤ 简义雄:《台湾钱淹脚目》,第83—86页。

^⑥ [清]王瑬:《钱币刍言》,清道光刻本,第17a页。

^⑦ 甘怀真:《中国中古时期“国家”的型态》,收于氏著:《皇权、礼仪与经典诠释: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4年版,第208—217、227页。

^⑧ 林满红:《银线》,第197页。

中国从南北朝开始将皇帝年号加在铜钱上,而由清朝要求新被统治的西藏铸造有清朝皇帝年号的通宝,可见中国传统的货币图案也有若干国家意象。由于中国的一般老百姓,即使到了20世纪30年代仍有85%以上男性及99%女性是不识字的,所以他们对皇帝年号这些概念认识不深。中国历朝铜钱可以并用,明清两朝尤其是清朝大量使用外币。中国的铜钱、纸币、银两都以文字为图案主轴,即使纸币有动物、植物等图像,但在1911年以前一直都没有出现国家领袖头像。这些都证明从货币图案来看,传统中国大多数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淡薄。相对以往有关中国传统国家观念或佛像的研究,本研究指出了在两千年中的传统中国,对佛祖与对国家的信仰存在着深浅之别。

Buddha vs State: Imperial China's Perception of Political Leaders' Bust on Western Money, 91 B. C. -A. D. 1911

Lin Man-houng

Abstract: In world history, money image can be classified into the Occidental Greek and Roman systems and the Oriental Chinese system. The Occidental systems involved the head images of political leaders while the Oriental system did not. *Shiji*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which was completed in 91 BCE, noted in its 63th biography “Dayuan”, “Anxi[Persia] ……uses silver as money coins on which the image of its king was minted.” However, this phenomenon was not observed in China until 1912. In that year Sun Yat-sen gave instructions of putting the portrait of the republic’s first president on the Founding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Commemorative Coins and the coins in circulation. This change still exerts influence on the present-day Republic of China as well as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During the two thousand years ranging from 91 BCE to 1912, the pattern of China’s traditional money was mainly based upon Chinese characters, using sort of images occasionally but the head images of rulers were not touched upon. For common people who were mostly illiterate, the reign titles shown in the money of traditional China was somewhat difficult to identify at a glance. Copper coins of past and present dynasties and that of foreign countries could be put into circulation concurrently. After the Opium War, China attempted to intimate the minting of silver coins that was circulating in the West, but it did not cast its coins with ruler’s head image. Comparatively speaking, from the 1st century onward Buddhism propagated widely in China and Buddha’s figures penetrated deeply in society. In Qing China people called the head images of rulers contained in foreign silver coins as “Buddha.” By way of money image which penetrated into people’s daily life, this study points out that while religious governance was obvious and deep-rooted in both traditional China and the West, China’s national construct was somewhat vague relative to the West, in terms of images on money. Compared with previous individual studies on the concept of state or Buddha’s figures in traditional China, this study sheds light on the different degrees of Buddha belief and national belief from 91 BCE to 1911. The paper is divided into four parts: 1) No political leaders’ figure head on Chinese imperial money; 2) Chinese traditional people’s access to Buddha’s figure heads from the 1st century BCE onward; 3) “Buddha head silver” dominant in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 centuries China’s land contract for the Spanish coins with the king’s bust; 4) Buddha vs state in traditional China.

Key Words: State Perception; Religious Governmentality; State-society Relation; Cultural Intercourse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Money Images in Traditional China

(责任编辑:丰若非)